

文史資料选編

第八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
文史資料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文 史 资 料 选 编
第 八 辑

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75印张 169,000字
1980年11月第1版 1980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9,700
书号：11071·139 定价：0.74元

(内部发行)

文史资料选编

第八辑

目 录

周恩来同志是什么时候从日本归国的?

- 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办公室 (1)
关于周恩来同志自日本归国的回忆 ... 张鸿诰 (11)

“一二·九”运动在清华..... 孙敦恒 (14)

巨浪，巨浪，不断地增长！

- 燕京大学“一二·九”运动回忆片断 ... 陈翰伯 (35)
“一二·九”运动中的《燕大周刊》..... 赵荣声 (72)
我对“一二·九”运动的回忆 张申府 (83)

张自忠将军的战绩与殉国经过述略

- 老 舍 遗作 (87)

我国现代机械工程学的先驱刘仙洲 ... 黎诣远 (92) 毕生致力于科教事业

- 庄前鼎教授的事迹 周撷清 (115)
为儿童健康贡献全部精力
——儿科专家诸福棠的事迹 肖 集 (130)

养浩庐中医院的创办者杨浩如

..... 洪 波 辑 五 (143)

前北京中医学会顾问袁鹤侪 谢海洲 (149)

中医药材学的奠基人赵燏黄 ... 洪 波 朱 晟 (153)

马约翰谈体育 唐纪明整理 (160)

附：马约翰生平事略 黄延复 (168)

我的童年（自传之一） 侯宝林 (173)

潘秉衡琢玉记 王名时 (197)

朱启钤与中国营造学社 单士元 (222)

新华门的今昔 疆 园 (226)

天桥的变迁 宗泉超 (230)

周恩来同志 是什么时候从日本归国的?

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办公室

一九七九年九月，我们在《文史资料选编》第三辑中刊载了何宗之同志所写《五四运动始末》一文，里面提到周恩来同志大约于一九一九年六月离开日本回到天津参加反帝爱国运动。一九七九年十二月，我们收到王克昌同志来信，指出周恩来同志是在一九一九年四月回到天津的。我们查阅了很多资料，并重新参观了“周恩来同志纪念展览”，发现这两个说法都有。为了弄清楚周恩来同志自日本归国的准确日期，我们于今年一月二十九日写信给邓颖超同志询问这个问题。邓颖超同志收到信后，很快作了答复，说明周恩来同志是一九一九年四月由日本回国的。这使我们受到很大鼓舞。我们又进一步与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天津历史博物馆、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周恩来研究室、周恩来青年时代在津革命活动纪念馆等单位共同研究周恩来同志自日本归国前后的史料，获得了以下这些初步认识。

一

周恩来同志确是于一九一九年四月自日本回国的。那年，周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周恩来同志在东京因参加以南开留日同学为主体的爱国组织“新中学会”，还经常到“中国青年会”参加政治活动，又阅读了很多马克思主义书籍，没有时间准备功课，未能考取公费大学，生活也有一定困难，于是三月间决定回国。三月中，周恩来同志在东京的同学张鸿诰知道他即将回国，特请他到住所吃饭，为他饯行，当时在座的有王嘉良、穆木天二人。张鸿诰知道周恩来同志字写得好，就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宣纸，请他题词留念。周恩来同志就书写了两年前他东渡求学时作的那首著名的诗：

大江歌罢掉头东，
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
难酬蹈海亦英雄。

诗后还有附言：

“右诗乃吾十九岁东渡时所作，浪荡年余，……返国图他兴，整装待发，行别诸友。轮扉兄以归游邀来共酌，并伴以子鱼、幕天，醉罢书此，留为再别纪念。
……”①

这首诗的墨迹现已由书店复制出售。

“返国图他兴”，据张鸿诰同志解释：这时周恩来同志接到张伯苓的来信，张伯苓告诉周恩来同志南开大学即将建立，动员他回国到南开上学。

① 轮扉就是张鸿诰，子鱼就是王嘉良，幕天就是穆木天。

在这以前，周恩来同志还将梁启超的诗录写送给南开校友王朴山。这时王继续留在东京早稻田大学攻读法律。梁诗如下：

献身甘作万矢的，
著论求为百世师。
誓起民权移旧俗，
更研哲理牖新知。
十年以后当思我，
举国犹狂欲语谁？
世界无穷愿无尽，
海天寥廓立多时。

王朴山先生一九三〇年病故，年仅三十四岁。这首诗的墨迹已由王朴山先生的家属献出，保存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其复制品在天津周恩来青年时代在津革命活动纪念馆展出。

一九一九年三月中，周恩来同志由东京到京都，在京都逗留了约一个月。四月五日作《雨中嵐山》、《雨后嵐山》、《游日本京都圆山公园》等诗，四月九日作《四次游圆山公园》诗。周恩来同志于四月内由神户港乘船回国。

关于这一段的情况，周恩来同志于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九日晚会见日本友人后藤钾二时说：

“我去日本不久，刚好十月革命就发生了。我回到中国不久，就爆发了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的‘五·四’运动。正是从十月革命到‘五·四’运动这段时间，我在日本。”

“我离开日本时，是在神户上船。在京都住了一个月。”

“我是一九一七年九月到一九一九年四月在日本。”

一九七二年九月周恩来同志会见田中角荣首相时也说：

“我那时在樱花盛开的时候，从神户港上船，从日本回国的。”

这里所说“樱花盛开的时候”，正是一九一九年四月。因为周恩来同志在一九一九年四月五日《游日本京都圆山公园》诗中，提到那时“樱花灿烂”；四月九日《四次游圆山公园》诗中，则已是“落英缤纷”。由此推算，他约于四月十日启程，大约于四月中旬左右回到国内。

一九一九年四月三十日出版的南开《校风》第一二三期上刊出一则消息：

“校闻 同学消息

毕业同学周恩来君前由日本回津，闻有考清华或北京大学之意云。”

这则消息说明了周恩来同志确是于四月三十日以前回到天津的。

二

“五·四”运动爆发时，周恩来同志正在天津，他很快投身到这场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中去。当时南开大学负责人为创办南开大学筹措经费，打算拉曹汝霖出任校董，以换取他们以卖国得到的赃款捐助学校。周恩来同志对此极为气愤。他团结在校同学，并联络已毕业离校的同学，揭露和反对学校当局这种无耻行为，严厉地批评了校方的办学方向，终于迫使曹汝霖等企图当校董的卑鄙

目的没有得逞。

估计周恩来同志大约于五月上旬写信给留日南开同学会，揭露南开大学校方企图拉拢曹汝霖的行为。当时中国、日本通信往来的时间约需一周到十天。留日南开同学会收到周恩来同志的信后，于五月二十一日写信给留美南开同学会，原文如下：

顷得同学周恩来自天津来信，节录于后，亦可见南开现状的一斑了。

节录周君来信：

(一)

南开的事体，我是不愿意冒昧说，冒昧管。现在我从各方面看，我说一句，实在是危险得很。校长也许别有肺腑，不过我总看不出，不止我，所有知道校长的人，都这样说。

(二)

你们诸位离天津远，还不知道内情。我是现在天天到南开去的，我是爱南开的，可是我看现在的南开趋向，是非要自绝于社会不可了。人要为社会所不容，而做的是为社会开路的事情，那还可以，若是反过脸来，去接近十七、八世纪，甚至十三、四世纪的思想，这个人已一无可取，何况南开是个团体。团体要做的事情，是为“新”，倘要接近卖国贼^①，从着他抢政府里的钱，

① 指曹汝霖等人。

人民的钱，实在是羞耻极了，哪能谈到为社会的事。

(三)

南开校内的学生都可造就，并且极有热心毅力，校中却不拿真学问教他，弄得一个个都是空的。并且校长近来人心大变，总是拿中国式的政治手腕办教育。“新”的一线生机仅仅在于学生。校长方面是天天讲 Democracy^①，可是样样事武断，闹的人心都离体了。

留日南开同学会启

五月二十一日

这封信原件存中国历史博物馆。从这封信的内容可以看出周恩来同志在“五·四”运动初期，立场鲜明，针锋相对地向曹汝霖等卖国贼进行了斗争。

五月十七日“敬业乐群会”在南开礼堂召开茶话会，周恩来同志参加了这次茶话会，并表演了游戏。

南开《校风》一二六期上刊登了这则消息：

“上星期六（五月十七日）晚，‘敬业乐群会’在礼堂开茶话大会，会资铜元六枚，到会者颇多云。”

又说：

“周恩来参加并表演游戏。”

“敬业乐群会”是周恩来同志在南开学校学习期间，于一九一四年三月和其他同学共同发起组织的一个以交流学习体会、培养

① 民主。

高尚思想情操为主的进步学生团体。周恩来同志先后担任了“敬业乐群会”的智育部长、副会长、会长及该会刊物《敬业》的主编。周恩来同志通过“敬业乐群会”领导了很多进步活动，例如：阅读报纸杂志，召开时事座谈会、辩论会、讲演会等；并在《敬业》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进步文章。从参加茶话会可以看出，周恩来同志在回到天津后不久，又和同学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并开展活动。

“五·四”运动后，各地相继成立学生联合会。天津学生联合会是在五月十四日成立的，谌志笃任会长，马骏为副会长。到六月初，周恩来同志虽未取得学籍，也已参加学生联合会的工作。六月三日，周恩来同志和谌志笃、马骏作为学联代表，赴商会见会长卞月庭等人，讨论成立各界联合会事宜。当时天津商会秘书长夏琴西在座，他写的回忆录中叙述了周恩来同志和卞月庭等商谈的情况。六月三十日，《南开日刊》第二十三号报道：天津学联代表马骏从上海写信说：“前者此间大概情形已见与周恩来、高连科君函。”说明周恩来同志和马骏等那时都已成为天津学联的重要骨干力量了。

三

一九一九年七月七日，南开留日同学代表在南开学校食堂开茶话会，慰劳在校同学。周恩来同志代表留日同学致词，提出了“有恒心、有胆力”，救国方能成功。一九一九年七月八日，《南开日刊》第二版刊载了这条消息：

“南开留日代表于奋兴会^①后，特在食堂开茶话会

① 指一九一九年七月七日南开学校救国团举行的奋兴大会。会议号召学生发扬斗争精神，“再接再励，牺牲一切，日日奋兴”，以期达到救国目的。

慰劳在校同学。首由周恩来君代表致词，略谓，留日学生在日本帝国束缚之下，行动不能自由，故无甚动作，实为惭愧。闻国内学生此种举动，钦佩无量。故今特慰劳，代表留日同学诸君以表爱慕之心，且定必随诸君之后。并言，吾人作事乃宜审慎，有恒心、有胆力方能成功。又报告留日学生情形，并拟组织南开出校学生会，以坚固之团体，多数人之意见，改良南开之校风及进行事宜，而发达南开真正之精神。……”

也就在这时候，周恩来同志参加了筹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工作，任主编。七月二十一日《学联报》创刊号出版，周恩来同志发表题为《革新，革心》的社论。在周恩来同志主持下，《学联报》影响愈来愈大，每期要印几千份到一、二万份，成为天津学联宣传反帝爱国思想的有力武器，是学联领导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得力工具。

一九一九年九月，周恩来同志与其他同志发起组织“觉悟社”。

一九二〇年一月二十九日，因抗议天津警察厅无故逮捕学生代表，随意封闭天津各界联合会和天津学生联合会，周恩来同志率领学生到省署请愿而被捕，在狱中写了《警厅拘留记》、《检尺目录》。

四

上述一九一九年七月以后周恩来同志的革命活动，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以前看到的历史资料都说，周恩来同志于一九一九年

六月从日本回国，这样，正好与上述活动相衔接。现在明确为一九一九年四月归国，那么一九一九年五、六两月周恩来同志在天津的活动是大家迫切希望了解的。我们访问了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天津历史博物馆、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周恩来研究室、周恩来同志青年时代在津革命活动纪念馆等单位，初步获得了以上认识。在调查过程中，所有接触到的同志几乎都指出，周恩来同志谦虚谨慎，为人稳重，不爱出头露面，所以在天津“五·四”爱国运动初期，周恩来同志偏重于在思想领导方面发挥作用。随着斗争的不断深入，也就逐渐把周恩来同志推到了第一线，成为天津“五·四”运动杰出的领导人之一。直到被警察厅拘留时，周恩来同志更表现了他的卓越的组织能力和高度的斗争艺术，更加受到群众的爱戴和敌人的痛恨。所以在警察厅拘留周恩来同志时，警察厅长杨以德竟想让他在释放后去黑龙江开垦荒地，离天津愈远愈好。可见，周恩来同志是在斗争中逐步成长，最后成为天津“五·四”爱国运动中一位杰出的领导人的。由于我们搜集到的资料不够，不免会有差错或遗漏的地方，希望读者给予指正并补充新的材料。

附：王克昌同志来信

编辑同志：

看了您会出版的《文史资料选编》第三辑，对其中两处提出我的看法。第十七页上写：“周恩来同志‘五·四’时正在日本留学。他为了投身于伟大的爱国运动，于一九一九年‘樱花盛开的季节’（大约六月）离开日本回到天津。”上面这段文字括号中“大约六月”是

不确切的。我查看了一九一九年南开学校校刊《校风》，在四月三十日以显著地位刊登出一则消息：“毕业同学周恩来君前由日本回津。”此报道证实周恩来同志是在四月下旬返回天津的，而不是六月份。当时“敬业乐群会”会员们在五月三日晚上还召开茶话会，演出精采节目，热烈欢迎自己的“老会长”。这再次证实周恩来同志不是在六月份，而是在六月份以前返回天津的。(以下从略)

北京白纸坊街道办事处校外办公室

王克昌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六日

注：王克昌同志的信中提出“敬业乐群会”会员们在五月三日晚上召开茶话会，欢迎自己的“老会长”归来。我们查阅南开刊物《校风》，并去天津南开大学等单位作了调查，并无此事。“敬业乐群会”曾于五月十七日晚召开茶话会，周恩来同志参加了这一活动。可能是这一事实的误传。

关于周恩来同志自日本归国的回忆

张 鸿 谱

我和周恩来同志在南开学校同班同学，我俩同住一个房间达两年之久，感情是深厚的。我在一九一六年考取东北长春县官费留学，到日本东京上学。一九一七年九月周恩来同志在南开学校毕业后，也到日本东京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学习日文和日语，准备投考中国政府指定的官费学校。周恩来同志在东京的一年半时间里，始终住在仲猿乐町五番地松泽方（这是根据各方面材料推测提出的），我住在紧靠中国青年会西侧一个小胡同里，这两个地方都属神田区，离得很近，我俩可以朝夕相见。一九一八年六月我考上了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继续官费留学，学校在本乡区。我搬到本乡区住，和周恩来同志住处相距就较远了。那一年我的妻子也来到日本。一九一九年三月，我听说周恩来同志要回国。那时，他参加了以南开留日同学为主体的爱国组织“新中学会”，经常到青年会等地方参加政治活动；他又用很多时间阅读了大量的马列主义书籍，如当时出版的《马克思全集》中的数册，还有《改造》、《解放》等杂志以及京都大学河上肇教授所写的经济学方面的书籍，他没有很多功夫准备功课投考大学。他的生活境遇也不好，他所住寓所的房钱等都由同学王朴山交付，再呆下去生活有困难。他准备回国了。我决定请他到我的寓所吃饭，为他饯行。那时和周

恩来同志住在一起的有王子鱼、穆木天两位同学，他们是一墙之隔，我就邀请他俩陪伴周恩来同志来我家吃饭。那天的饭菜很简单，是我妻子亲手做的。我们临别依依，席间谈吐很融洽。我知道周恩来同志写得一笔好字，所以事先我在东京街上买了宣纸，饭后就请他题词留念。他答应了，当即为我书写了一九一七年他东渡留学时做的诗：

大江歌罢掉头东，
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
难酬蹈海亦英雄。

写完诗还写了附言：“右诗乃吾十九岁东渡时所作，浪荡年余，……返国图他兴，整装待发，行别诸友。轮扉兄以旧游邀来共酌，并伴以子鱼、幕天，醉罢书此，留为再别纪念。……”写完后，周恩来同志告诉我，他回国要到南开大学上学，他已经收到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的来信，动员他回去考南大。这里说的“返国图他兴”，就是指的这事。他还表示他先到京都吴瀚涛（号涤衍）夫妻处住几天（吴也是南开同学，比我们早到日本，在京都第三高等学校上学），打算在那里等船从神户回国。神户是个港口，在京都的西南面，从路途上讲就在京都的下一站。后来我听说他为了省钱，是从神户港坐货轮回国的。

周恩来同志写给我的墨迹我很重视，我精心装裱后长期珍藏。一九二六年我回到祖国。敌伪时期我在东北，仍珍藏着这幅宝贵墨迹。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十一月我从南京专程来到北京

看望周恩来同志。我对他说起那年为他饯行的事，并告诉他我还留着那幅很有纪念意义的字迹，将来我要把这幅字送到博物馆去。他连连摇手说：“我还很不够！我还很不够！”此后，我们又会晤过。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我们敬爱的周恩来同志在长期重病之后和我们永别了。我在悲痛之余，又想起那幅珍藏了半个多世纪的名贵字迹，就不时拿出展阅，倍增缅怀之情。有一天，周恩来同志的弟弟周同宇的爱人（我的外甥女）来看望我，见到了那幅字迹。她说：“这可是国宝啊！大姨父，你怎么处理这幅字呢？”我也觉得我没有权利占有这样珍贵的文物，应该送交历史博物馆才好。于是我就把这幅字寄给了邓颖超同志，征求她的意见。一个月后，邓大姐把这幅字退给我，表示可由我自己处理。我就把这幅字送交历史博物馆珍藏，后来由文物出版社复制出售，现在很多人都能看到并欣赏周恩来同志这幅宝贵的字迹。